

苏联 高层决策70年

● 邢广程 著

● 世界知识出版社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2

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

——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

〔第二分册〕

邢广程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王 江

封面设计：丁 品

责任出版：车胜春

责任校对：苏灵芝

杨 光

余 岚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苏联高层决策 70 年——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邢广程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8

ISBN 7-5012-1010-1

I. 苏… II. 邢… III. 苏联—政治 IV. D7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586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大街 25 号 11 层 邮编: 100005)

世界知识出版社电脑排版 北京信诚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总印张 7·82.5 总字数: 1780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套

ISBN 7-5012-1010-1/D·202 定价: 118.00 元 (全五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分 册 目 录

第 3 卷 过渡时期

第 14 章	托洛茨基的挑战	3
第 1 节	初次挑战	3
第 2 节	列宁逝世后苏联政局的变化	12
第 3 节	再次挑战	21
第 4 节	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分歧	29
第 15 章	党中央出现新反对派	48
第 1 节	新反对派的形成	48
第 2 节	党的十四大上的对垒	59
第 3 节	几个重大理论问题的争论	72
第 16 章	两个反对派的联合	85
第 1 节	180 度的急转弯：两个反对派从对立到拥抱	85
第 2 节	第一次强攻和退却	92
第 3 节	在党的第 15 次代表会议上	98
第 4 节	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 7 次扩大会议上	103
第 5 节	中国问题上的分歧	112

第 17 章	联合反对派再次进攻和失败	127
第 1 节	托洛茨基的进攻	127
第 2 节	在 1927 年 7 月至 8 月中央联席会议上	132
第 3 节	1927 年 10 月中央联席会议上的决裂	140
第 4 节	中央和联合反对派斗争的几个焦点问题	148
第 18 章	布哈林派反对斯大林的政策	167
第 1 节	粮食危机及政治局内部的分歧	167
第 2 节	1928 年中央全会上的较量	174
第 3 节	布哈林迈出政治上的危险一步	179
第 4 节	党内分歧公开化	187
第 5 节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论分歧	196

第 4 卷 斯大林时期

第 19 章	高速度重工业化和工业改组	212
第 1 节	国家工业化方针的制定	212
第 2 节	编制五年计划	227
第 3 节	探索工业管理体制	235
第 4 节	1929 年至 1932 年经济改革	250
第 5 节	信用体制的改革	256
第 20 章	全盘农业集体化	264
第 1 节	发端	264
第 2 节	“走样”和“纠偏”	275
第 3 节	十六大关注农业问题	285
第 4 节	党中央巩固集体农庄的若干措施	290
第 5 节	1933 年斯大林谈农村工作	299

第 21 章	过激的政治决策	310
第 1 节	胜利掩盖下的危机	310
第 2 节	党中央处理基洛夫事件	315
第 3 节	大清洗浪潮	319
第 4 节	党内反对派主要首领的命运	330
第 5 节	制定新宪法	338
第 6 节	斯大林谈几个理论问题	345
第 22 章	外交智谋	351
第 1 节	在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稳定时期求生存	351
第 2 节	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357
第 3 节	集体安全体系计划	359
第 4 节	苏联的德国牌	371
第 5 节	战争开始后的外交策略	384
第 23 章	卫国战争考验	399
第 1 节	混乱的高层决策	399
第 2 节	一定要保住莫斯科	410
第 3 节	斯大林格勒战役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415
第 4 节	重拼反法西斯外交板块	422
第 24 章	战后初期的内政	437
第 1 节	斯大林的总结	437
第 2 节	个人崇拜现象的强化	442
第 3 节	艰难的探索	447
第 4 节	“列宁格勒案件”和“医生案件”	450
第 5 节	保守的十九大	455

第 25 章	斯大林的最后思想	467
第 26 章	战后初期的外交动作	489
第 1 节	反击美国的遏制政策	489
第 2 节	封锁柏林	503
第 3 节	对南斯拉夫的压制	508
第 27 章	对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政策	529
第 1 节	不相信毛泽东会战胜蒋介石	529
第 2 节	斯大林会见秘密访问莫斯科的蒋经国	533
第 3 节	苏联对华政策的转变	538
第 4 节	米高扬来华和刘少奇秘密赴苏	545
第 28 章	对新中国的外交政策	553
第 1 节	邀请毛主席访苏	553
第 2 节	对朝鲜战争的态度	575
第 3 节	1952 年同来访的周总理、刘少奇的谈话	581

第 3 卷

过渡时期

[1923 年秋至 1929 年秋]

20 年代是苏联惊心动魄的年代。围绕苏联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怎样建成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布尔什维克党内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中央政治局一直处于分裂状态。列宁预见的党内分裂状况遗憾地成为现实。

就联共（布）最高决策层而言，这种分歧并不奇怪，因为列宁去世给布尔什维克党带来了许许多多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挑战 and 难题。列宁去世给中央决策层所带来的政治真空是存在的，尽管列宁患病时期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联合起来暂时填补了这种政治真空，但理论上高瞻远瞩的气势只有列宁才具有。

列宁的判断是惊人的。党内分歧确实是从托洛茨基与斯大林之间的论战开始

的,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可能不积极地卷入这场激烈的党内论战之中。托洛茨基在列宁去世前后主动挑起党内大论战,标志着党内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存在着困惑和偏激情绪。在世界革命迟迟没有爆发的情态下苏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吗?必须回答这个现实问题:托洛茨基的观点是明确的,没有欧洲革命的支持,苏联是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的,换句话说,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只有在欧洲革命的胜利条件下才能取得。那么为了使苏联能够支撑到欧洲革命胜利那一天,苏维埃政权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实行“超级社会主义工业化”,将农民当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殖民地”,无产阶级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维持到欧洲革命到来。而斯大林和布哈林则无情地批驳了托洛茨基等人的观点。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理论核心,就是苏联一国可以而且能够建成社会主义,条件是必须坚持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

在托洛茨基被击败之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与斯大林之间的矛盾尖锐起来,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则更多地表现为最高权力之间的争斗。这是党内争斗的第二次高潮。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没有特殊的观点,他们基本上沿用托洛茨基的观点与斯大林和布哈林对抗,他们将斗争矛头直指中央书记处。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目光短浅,私利很重,理论观点是抄袭托洛茨基的,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党内斗争中一直陷于被动状态。他们被击败之后,无原则地倒向了曾经被他们批驳得体无完肤的托洛茨基阵营,从而失去了党内多数党员的支持和理解。联合反对派没有取得政治上的胜利。他们永远地失去了政治前途。

历史有惊人的不可思议之处。其后,又出现斯大林与布哈林的尖锐矛盾。斯大林与布哈林的争论,主要是围绕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进行的。斯大林坚持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的观点,但斯大林巧妙地将托洛茨基的“超级工业化”理论和“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观点融合到自己的理论之中,而布哈林则坚持只有通过新经济政策才能使苏联走上社会主义之路。尽管布哈林更多地坚持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但斯大林还是取得了胜利。

苏联共产党 20 年代大辩论给后人提供了两种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选择,更给后人提供了对社会主义深深的思考背景和材料。

第14章

托洛茨基的挑战

(1923年秋至1925年初)

第1节 初次挑战

争论的危机背景

一般地说，最高领袖患病之时，可能就是当局政治变换之日。最高领袖具有权威性的政治平衡作用和政治仲裁作用。他可以将党内不同的、矛盾着的政治势力加以规整，适当地抑制某种或某些政治势力，同时又适当地提携某种或某些政治势力，以求总体上的政治平衡，以求大致团结而稳定的政治局面。但是，一旦最高领袖患病，而且是长时期不能理政的病症，这就给党和国家带来相当大的政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一方面，最高领袖失去了把握政治大局的能力，当然也就失去了平衡不同的政治势力的能力，从而导致党内不同的政治势力出现不平衡、政局倾斜状态；另一方面，争夺党和国家最高政治权力的斗争在最高决策层悄悄地展开。列宁患病时期苏联最高决策层就出现了这种状况。列宁的预见是十分准确的，托洛茨基不能容忍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党内政

治势力居于主导地位。一场党内论战在列宁病重期间拉开帷幕。

1923 年秋天，是苏联的“多事之秋”。经济上，卢布行市不稳，货币贬值严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扩大，引起严重的“销售危机”。这不仅导致农民强烈不满，也引起工人罢工。这时期，城乡出现骚动，社会出现动荡；政治上，党内又出现新的工人反对派；国际上，保加利亚和德国革命失败，西欧革命运动正转入低潮；这时期，列宁卧床不起，病情严重；苏联最高决策层主要领导人之间很不团结。就在这种背景下，托洛茨基发起强烈挑战。从 1923 年秋到 1924 年 1 月，党又一次卷入了激烈的政治辩论中。

托洛茨基致党中央的信和 46 人致政治局的声明

托洛茨基是从党内民主问题切入的。1923 年 10 月 8 日，托洛茨基给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信中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所采用的强制性制度为党统管一切的制度提供了发展的可能性。而这种在党的第 12 次代表大会之前就开始形成的、后来又进一步得以发展的现行制度却比战时共产主义最艰难时期的制度更远离工人民主制。由于采用挑选书记的方法，党的机关的官僚化已经达到闻所未闻的程度。一个广泛的党的工作人员阶层已经形成并已分布到党和国家机关中，当这个阶层认为等级森严的书记体制就是能代表党的意见和作出党的决定的机关时，它已完全放弃了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至少放弃公开发表自己的观点的机会。在这个放弃发表自己看法机会的阶层下面是广大的党员群众，每项决定都是以要求的形式或命令的形式转达给他们。在这些党员基本群众中普遍存在着极其不满情绪。……这种不满情绪不可能由于群众似乎对党组织还能施加影响（选举中央委员会、书记等等）而得以消除，而只会悄悄地积聚起来，从而导致内部的紧张。”^①

提出党内民主问题并不是托洛茨基故弄玄虚。当时，党的制

度确实不够健全，民主空气不浓，委派制代替选举制，党内生活出现停滞状态。在此之前，党内许多人都从不同角度批评了党内存在的不良现象，指出党的机关官僚化的危险性。提出这种批评的不仅有党内反对派，还有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列宁对党的机关官僚化倾向十分不安。他批评的尖锐程度毫不亚于托洛茨基。

到1923年秋，党内民主制问题显然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问题。在9月中央全会上，捷尔任斯基激烈批评党内缺乏民主的现象，认为“党的涣散、党内生活的窒息和任命日益代替选举导致了一场政治危机，并使党对工人阶级的政治领导陷于瘫痪。”^②

如何克服危机？他提出一项极端的建议：所有党员应有义务向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检举那些与地下宗派小组有联系的人。这显然是针对正在活跃起来的工人反对派。但这种建议实际上把极端方法引入党的生活中，把党的活动置于国家强制机关之下，借助强制手段压制党内反对派。会上成立了以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以便研究如何改进党内制度并提出具体建议。然而，托洛茨基并没有与捷尔任斯基领导的委员会进行合作。他再次以“特有的方式”行动。10月8日的信是他向斯大林等人发出的挑战书。托洛茨基的挑战很快得到一些人的支持。10月15日，普列奥布拉任斯基、斯米尔诺夫、奥新斯基等46人联名给党中央政治局写信，这就是著名的“46人声明”。

“声明”说：“目前形势极端严重，我们（为了我们党的利益，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不得不公开告诉你们：继续执行政治局多数派的政策，将给全党带来严重的危害。今年7月底开始的经济和财政危机和由此产生的一切政治（包括党内的）后果，无情地暴露了党的领导在经济方面，尤其是在处理党内关系方面很不称职。”反对派继续表示：“中央的各项决定临时应付，轻率从事，不成体系，在经济方面没有做到收支平衡，结果，我们在工业、农业、财政和运输方面取得肯定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还面临着这些成就停止不前和严重的普遍经济危机的前景。而国家经济所取得

的这些成就从根本上说，不能归功于不称职的领导，而是在不顾这种领导，或者毋宁说，在缺乏任何领导的情况下取得的。”“如果不迅速采取广泛、周密、有计划和果断有力的措施，如果目前这种缺乏领导的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就可能面临空前尖锐的经济动荡，与此相联系，必然造成国内政治复杂化，并使我国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全部瘫痪。任何人都懂得，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需要这种对外的活动和力量，它决定着世界革命和各国工人阶级的命运。”反对派将矛头指向中央领导层：“我们在党内关系方面同时看到，在最近的危机中暴露得特别明显的领导错误正在使党陷于瘫痪和瓦解。”“我们认为，这并不是由于目前党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无能所造成的。相反地，尽管我们在评价局势和选择改变这种局势的措施时，同他们会有分歧，我们还是认为党必须让现在的领导继续担任工人专政的各级领导职务。我们认为危机的原因在于我们在保持官方团结的表面形式之下，实际上我们在确定人选和行动指南时，都是片面地适应一个狭小的派别的观点和意愿。由于党的领导被这样一些狭隘的考虑所歪曲，党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一个生气勃勃的自己发挥作用的集体。不再是真正进行生动的活动并与它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的集体。与此相反，我们看到党正在日益分裂为书记特权阶层和‘普通人’，分裂为由上层选定的党的职业官员和不参加他们的派别生活的普通党员群众，这对任何人都不再是秘密了。”反对派表示，党员已经不敢在会上提出批评意见。“党内的自由讨论事实上已经化为乌有；党的舆论已经窒息了。在这种情况下，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能提名选举俄共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党内建立的制度是完全不能忍受的，它扼杀党的独立自主精神，以特选的官僚组成的机关来代替党，这个官僚机关平时可以运转自如，但危机一旦到来就必然发

生故障，并且会有在日益迫近的严重事变面前根本不能应付的危险。”“这种情况的造成，是因为第10次代表大会后客观上形成的党内派别专政制度已过时了。我们当中许多同志曾经自觉地保证不反对这种制度。由于1921年事件的变化，后来又由于列宁同志患病，我们当中许多同志都认为需要采取党内专政性质的临时措施。另一些同志从一开始就对此抱怀疑或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在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上这种制度实行得过头了。它开始走向自己的反面。党内约束开始松弛。党开始走下坡路。当时就显然不健康的党内多种极端反对派倾向，开始具有反党性质，因为党内对棘手问题不能进行同志式的讨论。本来，这样一种讨论是能够轻而易举地向这些派别的大多数参加者并向党员群众揭露这些派别的不健康的性质的。结果就出现了引导党员超越最后界限的非法集团，并使党脱离工人群众。”反对派警告：“如果不在最近的将来彻底改变当前的这种局势，苏维埃俄国的经济危机以及党内派别专政的危机就会给俄国的工人专政和俄国共产党以沉重打击。”反对派表示：“派别统治必须消灭，而首先必须消灭它的祸首，用同志般的团结和党内民主的统治去取代它……”^③

托洛茨基的信和“46人声明”没有在报刊上发表，只是在党组织内部传阅。

批判、争论、妥协和共识

托洛茨基等人将斗争矛头指向党中央决策中枢，指向党的“中央书记阶层”，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动向，党中央当然不能回避这个问题。1923年10月底，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会议还邀请彼得格勒、莫斯科等10个最大的党组织代表以及“46人声明”中的13位签字者参加。列宁和托洛茨基因病未能参加全会。托洛茨基分子在这个全会上失败了。会议以102票赞同、2票反对、10票弃权通过一项谴责托洛茨基及其同盟者的

决议。^④决议指出，“托洛茨基在世界革命和党所经历的最严重的关头进行发动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这尤其是因为托洛茨基对政治局的攻击客观上具有派别活动的性质，使党的统一有遭受打击的危险并造成党的危机”。决议认为：“46人声明”是“派别分裂政策的一个步骤，不管签署这个声明的人的本意如何，这个政策是带有派别分裂的性质的。这个声明有使党在最近几个月来的全部生活处在党内斗争标志下的危险，从而在决定世界革命命运的最严重的关头削弱党。”决议当时没有公开发表。显然，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不想公开辩论。

但形势发展已使党内公开辩论不可避免，于是，党中央决定进行公开政治辩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等人也改变策略。他们首先在党报上披露党内民主问题。1923年11月7日，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上发表题为《党的新任务》一文。文章说：“近来，在党内生活中真是太风平浪静了，有些地方甚至简直就是停滞不前”，“我们主要的灾难往往是：几乎所有重要问题都是上面决定了后再下来。这就使广大党员群众的创造性受到限制，使基层党支部的自主性减少了”。季诺维也夫还号召就党内民主问题进行自由辩论。于是，《真理报》从11月13日起开始定期登载有关党内民主问题辩论的各种材料和文章。其实，辩论双方的观点差别不大，都认为党内形成的局面是一种不正常状态，并且都呼吁全面发展党内民主。这期间的辩论主流是积极的，健康的，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这样，辩论双方出现了相互妥协的基础。

1923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通过激烈的辩论，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决议写道：“只有经常的、生气勃勃的思想生活，只有经常批判地研究自己的过去，改正自己的错误，只有集体地讨论重要的问题，才能保存我们的党像它在革命成功之前和革命当中刚刚形成时的那样的党。只有这样的方法才能真正地保障那些个别问题，个别时期的意见分歧不至于变成党派的小组织。”决议还指出：“监察委员会

的特别重要的任务就是在党的机关和党的实践中与官僚主义对党政策的歪曲行为进行斗争，对那些妨碍在党组织日常工作中实现工人民主原则的负责干部追究责任（如：限制在会议上的发言自由，或在选举时进行党章未规定的各种限制等等）。”^⑥这个决议与上次联席会议的决议不同，其基调是十分积极的，没有给托洛茨基再扣帽子。遗憾的是，这样一个好的决议后来没有被收入党的决议汇编中去，更没有成为党内生活的准则。这只能说明，当时争论双方都以“党内民主”问题为抵押品，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新方针》：托洛茨基醉翁之意不在酒

双方妥协了，决议被一致通过。看来这场来势迅猛的党内辩论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但事情并非如此。托洛茨基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一向以专断和“拧紧螺丝帽”而著称，现在他突然关心起党内民主来，与其说他的工作作风改变了，不如说他想借助这场辩论来改变党的领导成分。在他看来，决议的通过是他及其同盟者的胜利。表面的目的达到了，但排挤政治对手的目的尚未达到。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

12月8日，即决议发表的第二天，在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托洛茨基抛出了以《新方针》为题目致党会议的信，并向其他党组织散发。12月11日，《真理报》发表了该信。托洛茨基此举不仅是策略上的失误，而且也是重大的政治上的战略失误。此举表现出托洛茨基无视党的决议，把个人和派别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这不仅遭到其政治对手的激烈反对，而且也失去许多支持者，就连他最亲密的一些拥护者也拒绝支持他新发表的言论，并指责《真理报》发表了《新方针》。随后，托洛茨基又连续发表了《小集团和派别组织的形式》、《关于党内新老两辈的问题》等一系列文章，使辩论进一步扩大。

托洛茨基所阐述的一些观点十分引人注目：

第一，他把矛头直指“书记阶层”。他说，“党的领导越是由排外的‘书记’一类指挥人员来代替，这种危险就越严重”^⑧，“认为书记有了书记这个头衔就能在他身上体现党的领导所必需的全部知识和本领，这实在是幼稚的想法。实际上，他为自己建立起拥有官僚主义部门、官僚主义情报和书面资料的附属机构……同生龙活虎的党隔离开来。于是，出现了如同德国谚语所说的：‘你认为你在推动别人，其实是别人在推动你’”。^⑨

第二，中央是官僚主义发源地和大本营；行政命令方法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他说：“官僚主义并不是个别外省组织的偶然特征，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它不是从县里产生，经过省再向中央扩展；正好相反，是从中央经过省再扩展到县。官僚主义决不是战时的‘残余’，而是把最近几年积累起来的行政命令方法搬到党里来的结果。不管战争时期的官僚主义在个别情况下具有何种畸形的形式，同目前的官僚主义比较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目前的官僚主义是在和平发展条件下形成起来的。”^⑩

第三，党内的官僚主义制度是派别集团形成的原则。他说：“局部的意见分歧和暂时的意见分歧在一定条件下可能转变成为固定的小集团；同时后者又可能迟早发展成为有组织的派别；最后，业已形成的派别把自己同党的其余部分对立起来，从而会更更多地受到党外的影响。在共产党出于必要而独揽政治生活领导权的时代，党内小集团的辩证法就是如此。”^⑪托洛茨基认为，克服党内派别斗争的根本方法是“发扬民主”。

第四，“青年是党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对党的官僚主义的反应最敏感”，“只有老一代和青年一代在党内民主的范围内经常相互影响，才能保持老近卫军这一革命因素。否则，老一辈就会僵化，就会不知不觉地成为机关官僚主义的最完备的体现者。”^⑫

托洛茨基一意孤行，铸成政治大错。他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内高级领导人，他可以通过正常途径向党中央领导核心提出建